

青史斑斑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这个在今人看来与老人、孝道相关的节日，在古代有着更加丰富的寓意与期许；佳节又至，我们来谈一谈重阳节的起源与风俗。

重阳缘起

“重阳”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屈原的《天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是否说明重阳节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呢？非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集聚九重阳气进入帝宫，探访句始星（太白星）、参观清都天庭，“重阳”指的是九重阳气，即“天”，而非节日。

传为西汉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中曾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因此有人认为西汉初期皇宫内已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等习俗，进而推测重阳节在西汉时已经形成。但实际上，《西京杂记》是晋人葛洪辑录的，刘歆实为假托的“作者”，因此这条记载不足以说明重阳节在汉代的情况。

确信的记载出现于东汉《艺文类聚》：“九月九日可采菊花”，说明九月九日在东汉是一个节日；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中也称“九月饮菊花酒”为“汉俗”；此外唐人虞世南《北堂书钞》曾记载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说明东汉九月九日有宴饮之俗，这正是后世重阳节的节俗。综合而言，重阳节最晚在东汉时已经形成。

重阳节为何出现，很多人认为与《易经》有关，在此书中，“九”为阳数，因此九月九日被称为“重阳”，再加上“九”有“久”的谐音，重阳代表着长长久久，是值得庆祝的好日子。这一说法见于曹丕的《与钟繇书》：“岁日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

会。”但根据重阳节出现的时间来看，这应该是节日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赋予的解释与期许，而非最初形成的原因。

重阳节出现于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最可能的原因应与农事相关。一般来说，农历九月，农事已经到达尾声，丰年庆典与祭祀活动开始进行。《吕氏春秋》记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五种兵器）、豨马（豨即为搜，选择之意）。”由于兼有祭祀和庆典的意义，也不乏宴饮等娱乐活动，因此，九月祭祀、田猎的习俗逐渐发展为重阳节是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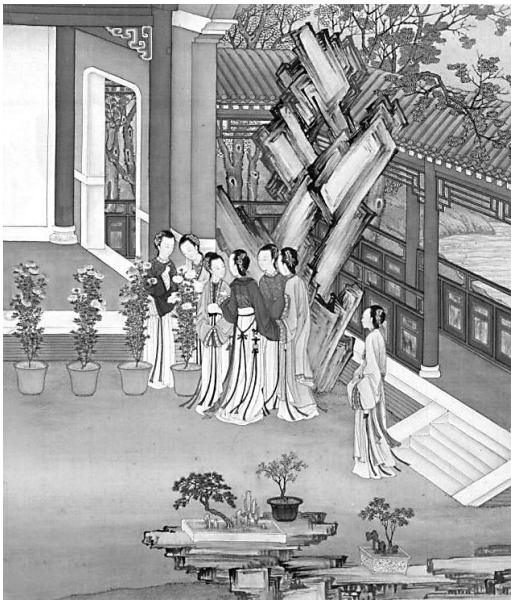
有学者认为重阳节的形成还与火神有关，这一观点的理论来源与星象有关，农历九月，代表火神的恒星“大火”会隐退，远古先民将之看作天气变冷的预兆。远古时代，先民的御寒能力十分薄弱，很多人在寒冷的冬季中失去生命，所以人们会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祭拜火神，以求护佑。这一情形与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难”的习俗相符。

重阳风俗

重阳节的风俗在南朝梁吴均所作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中有所体现：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问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故事固然不可信，但节俗却是真实存在的。首先是登高。金秋九月，天高气爽、丹桂飘香，正是郊游登高的好季节。根据上文，最初的登高活动，目的在于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才演变为娱乐活动。史传东晋陶灵为了登高还发明过登山木履，“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



重阳赏菊图，选自清人陈枚所绘《月曼清游图册》，陈枚以描写宫廷生活见长，该图册现藏故宫博物院。

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是一种鞋底有可拆卸木齿的木履，李白“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中所说的“谢公屐”正是此物。在少山的平原地区，人们也会登上亭台楼阁等建筑，凭高眺远，如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都（汴梁，今开封）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

其次是赏菊、饮菊花酒。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因此也被称为“菊月”。菊花在中国文人雅士的眼中是高洁、独立的象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传为千古名句，无数文人对此心有戚

戚，赏菊也成了文人雅集的普遍活动。此外，菊花可入药，是百姓心中可辟邪祛病的植物，因此在重阳也有饮菊花酒的习俗，人们在头年九月采下初开的菊花和茎叶，掺入粮食中酿酒，甚至还会加入多种草药，在来年重阳时饮用，被称为“长寿酒”。

佩戴茱萸也是重阳的典型节俗，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使得这一节俗更为人们所熟知。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常绿带香的植物，果实为红色椭圆形，小巧可爱，有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除了佩戴，人们还会将茱萸制成酒，《辽史·礼志》记载九月九日“又研茱萸酒”，不过其用途似乎并不是用来饮用的，而是要洒到门户上以除灾害的。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元宵的汤圆、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仿佛所有节日都能与食物产生关联，那么重阳节有时令美食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狮蛮”。

“狮蛮”又称“重阳糕”“花糕”，是经过装饰的面食糕点，在北宋已经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记载重阳节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遣送，上插茱萸小旗，掺钉（混杂在一起）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南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中也记载了狮蛮的做法：“蜜煎局（宋代提供宴会服务的机构之一）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炸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俱衬进酒，以应节序。”

总体来说，无论是重阳节的起源，还是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节俗，都与人们避厄消灾、健康长寿的愿望有关，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期许。我国把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也就是重阳节定为老人节，重阳节既表达了对父母传达爱意、彰显孝道的日子，这也是现今社会对古代节俗的发展，也是当代文明对传统美德的传承。

兰台钩沉

御史柳宗元

■岱石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江雪》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那么，柳宗元为什么写这首诗，这首诗又反映了他怎样的心境呢？这就需要先了解一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柳宗元生活在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的局面。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在顺宗支持下进行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打击宦官专权，但终因政治力量不足，革新以失败而告终。柳宗元是“二王八司马”中的八司马之一，当时，王叔文“尤奇待宗元”，及得政，提拔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放在身边“与之图事”，并“欲大进用”。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与刘禹锡等八人一起被贬地方任司马，柳宗元任永州司马。这首诗正是柳宗元在永州期间创作的，是典型的以诗言志，表达了一个政治家不向黑恶势力屈服，决心秉志特立的悲壮气节。

作为政治家，柳宗元在他的《梓人传》中对治国理政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资治通鉴》专门择要作了摘录，足见柳宗元政治思想值得后人重视借鉴。文章以“梓人（建筑设计师）”的传奇事迹为喻，通过“梓人之道”阐述治国的大道，提出治理天下应“条其纲纪”“齐其法制”；“择天下之士使称职”；“居天下之人使其安业”；“不佞能，不矜名”，夸耀自己的才能，自尊自大；“不亲小劳”，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不侵众官”，干涉下属分内的工作，而是应专心研究“大者远者”等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正如梓人善于运用众工匠一样，领导者要善于使用好各方面的人才。

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地方官吏加紧了对广大农民的盘剥。农民除了向国家交纳正常的捐税外，还要承受地方官吏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可谓“苛政猛于虎”。针对基层官吏繁政扰民的情况，柳宗元写下名篇《种树郭橐驼传》。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说明“为政亦然”的道理，批评当时基层官吏“好烦其令”，主张与民休养生息。他批评“且暮吏来，聚民而令之”，基层官吏不断催促百姓耕织劳作，表面上好像是怜爱百姓，但百姓反受其害。他借用郭橐驼的口质问，百姓们整天忙于应酬官吏不得空闲，又怎么能繁衍生息，安定民心呢？通过这篇寓言，他对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顺天养民的政治主张，《资治通鉴》赞扬“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在永州谪居十年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终于被召回首都长安，但随即又被贬为柳州刺史，直至五年后病死在任所。虽然命运多舛，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柳宗元始终心中装着百姓，在柳州期间做了许多利国惠民的好事。其中，最为史家所推崇的是释放奴婢事件。对此，《新唐书》和《旧唐书》都作了记载。当时“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柳宗元“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可以出钱赎回，也可以通过为债主服役的方法赎身。对于最贫穷的奴婢，柳宗元就自己出钱赎回他们，并送归其父母。在柳州期间，柳宗元还兴办教育，学子们不远千里来向他学习请教，凡是经过他指点的人，“为文辞皆有法”，大都成为当地名士。在柳宗元的主持下，柳州百姓争先学习汉语，在外仁爱，在家

慈孝，民风得以醇厚。人们居住有了新房子，代步有了新船，喝上了干净甘甜的水，破旧的街巷得到整治，庙宇得到翻修，池塘园林清洁整齐，逃亡流窜的人纷纷回归，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三年努力，柳州百姓高兴地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远离京城，但我们也是天子的子民，现在上天派来仁爱的柳侯，还有什么理由不遵从教化呢。“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质朴的柳州人民把柳宗元永远敬为他们的柳侯，世世代代敬仰。在柳宗元辞世后的长庆三年（823年），韩愈为吏部侍郎，应柳州官民所邀，欣然为柳宗元书写了墓志铭，赞扬柳宗元“生能泽其民”。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这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柳宗元贬谪柳州后创作并寄与刘禹锡等四位共患难的朋友的一首七律，充分抒发了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的深厚情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同科进士，同朝为官，又共同参加“永贞革新”，成为推动唐代中期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后来又同样遭遇两次被贬流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患难之时见真情。元和十年时，柳宗元贬岭南柳州刺史，刘禹锡更偏远的古夜郎国播州刺史。柳宗元感叹说：“播非人所居，而梦得（刘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者，如不住，便为母子永诀。”即草草奏，欲以柳州授刘禹锡而自往播州。逝世前，柳宗元留书给刘禹锡托付后事：“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执书以泣，将他遗留下来的著作编成《柳河东集》，并亲自作序，凝结成了两位监察御史的正气之歌。



柳宗元像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人，唐代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黔之驴》《捕蛇者说》等文章家喻户晓，特别是同韩愈一起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复兴儒学，对推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柳宗元还是唐代中期的监察御史、政治家。

正史上讲，柳宗元少时“聪警绝众”，文章“璨若珠贝”，当时人“咸推之”。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十年后又与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柳宗元家族还是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其先祖柳爽曾任中书令（宰相），他的父亲柳镇则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任侍御史。柳家可谓满门忠烈，御史世家。

开物东方

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合办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十八

温室栽培

■杜新豪

温室栽培是指利用能保暖、加温、透光的设备及相关的技术措施，人为地创造适宜植物生长的小气候环境，以保护植物御寒、御冬或促使生长和提前开花、结果，它的出现打破了植物生长的地域和时空界限，满足了园艺作物周年连续供应的需求。我国是世界上温室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温室增温技术方面有诸多创造。

据记载，秦始皇曾命人冬季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种瓜，在冬季寒冷的北方种瓜，肯定

会有所覆盖，据此推测中国最早的温室可能出现在秦代。然而有关温室最早的确切记载出现在汉代。汉元帝于上宫园中种葱、韭、菜茹，采用的办法是盖一宦官封的屋厦，在屋内昼夜燃火来提高室温，这样蔬菜就得以在隆冬正常生长。当时各地向朝廷进贡的新味就有很多是通过“郁养强熟”的方式培育的，富人享用的东西也有“冬葵温韭”，说明早在汉代利用温室栽培蔬菜已变得较为普遍。温室还被用于花果栽培，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堂花术，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惯看温室树，饱识浴堂花”的诗句，堂是用纸饰密室（很可能是用纸作为温室的窗子来增强透光性，而不是有些现代学者解读的用纸做成房子），在室里开沟，把花盆放于沟上用绳与竹搭成的架子上，在沟中倒入热水，并施牛溲、硫磺等热性肥料，以增加室内温度，通过这种办法来促使堂中的花卉提前开放。这种花卉栽培技术在唐代出现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北京中山公园的唐花坞使用的技术就

是从堂花术发展过来的。

古罗马约在中国汉代之时也出现了温室，是一种用云母片搭成的暖房，比中国用纸糊等方法透光性强，但没有中国类似的生火等内部加热的措施，其技术也未能流传下去。温室在其他地区的出现则要晚得多。西欧的温室栽培出现在18世纪初，美国则是在1880年开始有温室栽培，日本是在1830—1840年才有温室，日本的温室称为“纸屋”，很可能受到中国堂花术的影响。

史海逸趣

廉石忆清

■厉海洋

个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决定其行为做派，古代清官廉吏通过三块石头，告诉了我们廉洁方能聚人，律己方能服人，无私方能感人的道理。

三国时期，苏州人陆绩出任郁林太守，在他的努力下，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陆绩也因此深受百姓爱戴。任期转眼即至，当时陆绩返乡只能走水路，起程当天风高浪急，船在码头摇摆不定。船夫见轻舟渡江难压风浪，不敢开船，建议陆绩找一些重物压船。陆绩任职期间不收受金银财物，因此他的行李只有一些轻便的生活用品，他便请人将岸边一块大石头搬上船来压舱，船夫和前来送别的百姓无不感叹陆绩为官清廉。这块乘风破浪的“廉石”，也被后人保留在陆绩的故乡受人瞻仰。

优秀的传统必将被人们传承。在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内也竖立着一块凌霄怪石，这是明代张弼任南安知府时留下的。张弼一生为官清廉，任期湖广道、建社学，逢荒年开仓济民，深得民心。离任返乡时，他只有简单的行李和一些书籍，由于船体太轻不胜风浪，张弼便效仿陆绩的做法，与儿子一起作挑夫打扮上山寻石。山上百姓认出了张弼，对他说：“像您这样勤政爱民又清廉的官员，不要说一块巨石，您就是要这座山，我们也乐意给您。”张弼归乡那天，来送别的百姓无不动容，张弼自言：“为官十载无家财，青石压船抗风浪。”说完便向父老作揖道别。

扬州评话中有一段严清的故事，虽然极有可能是传说，但我们亦不妨听听。清代兴化县官严清，刚上任就自许要在此地留下清名，上任后他努力公事，清廉自守。离任前，他摆酒席答谢众人，谁知开席前，有人特意送来一条青鱼，只见该鱼从头至尾都是青色，就是在尾部被人为了点石灰水变成了白色。严清恍然大悟，这叫头清尾不清，问题直指今天的宴席。严清立即命人撤去宴席，准备开船返乡。严清没有多少行李，只身一人返乡，想到轻舟不胜风浪，就请船夫搬来河边一块大石压在船头，自己坐在船尾。下船时，严清感慨道：“头清尾不清，石头压船身，千里还青石，寄望后来人。”并请船夫将这块压船石带回兴化。

“清节足矣励万世”。古代清官廉吏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壮大，这些朴素至简的勤廉思想和实践，在历史和现实中为我们架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

乡贤故事

“国之司直”毛玠

■辛曼

毛玠，字孝先，三国时期魏国的一位大臣。在名著《三国演义》中，毛玠是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的水军都督，被小官清写得平庸。历史上真实的毛玠是个文官，早年在县中为吏，后来跟随了曹操，被任命为治中从事。他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战略规划，得到曹操的欣赏，被称为“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曾做过东曹掾，职务不能说很高，但权力不可不小，主管官吏的选拔任用。毛玠能名留史册，与他这一时期为官清公正、铁面无私有很大关系。不看虚名，不论关系，只看重品德和才干，这就是毛玠举荐任用人才的标准。有些名士就算在当时有些名望，但行为不正派，他照样弃之不用。曹操对此赞叹说：“这样选人用人，使天下的人自己监督约束自己，我还再费什么心思呢！”曹操不做五官中郎将时，亲自去见毛玠，托他照顾一下自己的亲属。毛玠说这是“攀高枝”“卖人情”的好机会，谁知毛玠直言回绝：“老臣因为能够尽忠职守，所以有幸没有获罪，您现在所说的人不应升迁，所以我不敢遵命。”

别说曹还在毛玠跟前“没面子”，就连曹操想帮人通融，毛玠也不买账。曹操有个老乡叫丁斐，因为曾救过曹操的命，曹操凡事对他都宽容几分。但丁斐这人爱占小便宜，在跟随曹操讨伐东吴途中，把自家瘦弱多病的牛换成了公家的一头壮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最后被人揭发，丢了官职。到这个地步了，毛玠依然不依不饶，多次请求曹操对丁斐按律重罚。曹操考虑到丁斐曾救过自己的命，还是放了丁斐一马，但曹操对毛玠的铁面无私更加敬重。

后来，毛玠担任尚书仆射，再次掌管选才任人之职。虽然身居高位，毛玠却生活俭朴，粗衣素食。而对孤苦贫寒的族人和平民乐于救助，以至隐退之时，家财所剩无几。毛玠这种率先垂范、克己节俭的处世风格，引领天下士人以廉洁的操守来自我勉励，即使显贵得宠的臣僚，服饰器物也不敢造反过度。曹操平定柳城，分赏所获得的器物时，特地将一幅屏风和一件套凭几赏给毛玠，说：“你有古人的风范，所以赏你古人所用的器物。”

毛玠为官做事坚守原则，公正清廉，曹操曾赞叹他：“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周昌是刘邦身边的大臣，以直言而著称，对刘邦成就霸业助益良多。